

从家庭羁绊到社会觉醒: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妇女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重构(1942—1945)

朱成山¹, 李琳琳²

(1.常州大学 红色文化研究院, 江苏 常州 213614;

2.常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常州 213614)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妇女的解放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实践。通过践行“以劳动解放促进妇女解放”的延安经验,山东根据地探索了兼具战时经济需求与适合妇女性别特点的劳动形式,包括恢复家庭手工纺织业、采取家务“工分制”、调整生产内容等,将大批农村妇女纳入根据地生产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妇女在大生产运动中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调动,她们陆续从家庭的羁绊束缚中走出来,用实际行动支持和参与抗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关键词: 山东;大生产运动;劳动观念;妇女解放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5)06-0079-10

收稿日期: 2025-1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BZS137);抗战时期中国国际难民区档案整理与研究。

作者简介: 1.朱成山(1954-),男,江苏南京人,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2.李琳琳(1996-),女,山东潍坊人,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6.008

20世纪40年代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处于战争与革命交织的关键时期。作为一个以省级区域为主体划分的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扼日据大城市天津,东濒渤海黄海,西临冀豫两省,南接苏皖北部,是连接华北与华中、鲁南与苏北的重要通道和战略枢纽,下辖滨海、鲁中、鲁南、渤海、胶东五个战略区。贯穿山东全境的津浦铁路与胶济铁路,是日军对华北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重要交通命脉。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山东成为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日益壮大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日军扫荡的重点目标。面对日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逐步意识到单纯依靠军事斗争难以持久,必须发展生产以巩固根据地,“一九四二年才开始组织生产,发展纺织业,进行各种经济建设”^①,1944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全面发起了大生产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作为长期被传统家庭经济束缚的群体,被纳入根据地生产体系,其劳动方式和社会角色发生了深刻变革,使她们在社会生活逐步觉醒,自觉地投身抗战的洪流之中。

目前,学界对大生产运动时期妇女解放的研究多集中于陕甘宁边区,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探讨相对不足。事实上,山东农村妇女的劳动重构不仅体现了战时经济需求与乡村社会性别秩序之间的复杂互动,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本土化实践。本文基于《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大众日报》等一手史料,考察山东抗日根据地1942—1945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使妇女劳动如何成为农村家庭主妇们走向社会的桥梁,以及这一过程对农村妇女群体和抗战时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多重压力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妇女生产动员

在日军严密封锁和根据地经济遭遇极大困难的多重压力下,山东抗日根据地亟须动员一切可能的生产力量。其中,占农村人口将近半数的妇女群体,因其长期被束缚于家庭劳动而蕴含着巨大的生产潜力,自然成为根据地生产动员的关键对象。山东抗日根据地既有应对战时经济危机的现实需求,又受到延安妇女

^①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页。

解放经验的影响,同时契合了农村妇女自身寻求解放的内在诉求,三者共同构成了推动妇女劳动重构的历史动力。

(一)战时经济困境

全民族抗战时期,特别是到了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山东抗日根据地遭受了日伪军的残酷军事打击与严密经济封锁,物产丰饶、粮棉自给的山东地区,“1941年至1942年间,山东抗日根据地同其他敌后根据地一样,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①1940年起,敌军持续强化“扫荡”和“清剿”行动。1941年春,日伪扫荡临费边区,仅岸堤一带,就拉走耕牛百余头;同年九月,日伪在泰山区大扫荡,在上港一带抢走牲口数千头;据统计,仅滨海区公粮损失就高达119万余斤。^②1941年11月,敌人对鲁中山区进行长达半个月之久的“清剿”,对根据地实行更加彻底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③时任山东分局委员的黎玉在书中回忆这次扫荡,“大片村庄被烧毁,大批无辜百姓遭屠杀,其状惨不忍睹”^④。与此同时,与军事围剿相配合的,是日伪政权日益加紧的经济控制。“1941年,济南日伪成立经济统治委员会,专门统制经济与封锁我抗日根据地,北平、上海之敌也为之配合封锁。”^⑤经济统治委员会通过行政手段强制统制粮食、棉花、煤炭等战略物资的流通,严禁这些物资流入抗日根据地。同时,北平、上海等地的日伪政权也协同行动,在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严查货物运输,切断根据地与外界的经济往来。在日伪的严密封锁下,根据地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军民急需的食盐、药品、布匹等日常用品极度匮乏,黑市价格飞涨,一块肥皂的价格甚至涨到战前的数十倍。自然灾害引发的粮食歉收也加剧了根据地的人口压力与资源紧张。1940年至1942年间,山东地区连续遭受严重水旱灾害,粮食大幅减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群众以树叶树皮充饥的极端情况。

面对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和自然灾害的三重打击,加之初期对经济生产工作重视不足,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控制区域不断缩减,迎来了创建以来最为艰难的生存考验。面对严峻形势,山东抗日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先后颁布《关于克服春荒解决军民食问题的决定》^⑥《关于禁止酿酒的决定》^⑦等系列政策,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也发布《关于救济旱灾的紧急指示》^⑧,一方面加强粮食统制,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号召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在战斗间隙开荒种地,这一特殊历史情境客观上为妇女参与生产劳动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为了更好地解决各敌后根据地面临的生存问题,加之陕甘宁边区生产自救的成功经验,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强调“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生存策略,明确提出“党部、政府及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有关明年全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⑨9天后,中共山东分局发布《为贯彻中央十月一日指示的决定》,强调“实行明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⑩。在借鉴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山东地区减租减息运动的陆续开展,一场“党政军民学与人民群众绝无例外的自己动手的生产运动”,于1944年在山东抗日

①朱玉湘:《山东近代经济史述丛》,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9页。

②朱玉湘:《山东近代经济史述丛》,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9-230页。

③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页。

④黎玉:《黎玉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165页。

⑤朱玉湘:《山东近代经济史述丛》,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0页。

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6页。

⑦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7页。

⑧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6页。

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98页。

⑩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1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页。

根据地正式拉开帷幕。

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农村妇女作为潜在的生产力被“组织起来”,“到1945年,全省有120万妇女参加纺织生产”^①。大生产运动为山东农村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提供了重要历史契机,成为她们进入公共领域、拓展社会空间的关键转折点。

(二)延安经验的本地化运用

赛尔登(Mark Selden)提出的“延安模式”概念,特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施的一系列有关政治、社会、经济的系统性实践,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以劳动解放促进妇女解放的“延安经验”。陕甘宁边区率先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实践探索中不断调整完善,在生产工作中逐渐关注到妇女群众实际需求。经过努力,边区政府创新性地将妇女动员与社会生产相结合,成功引导广大妇女走出家庭、投身社会生产领域。经济地位的提升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地位,顺带缓和妇女所在的家庭矛盾,为边区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条新的妇女解放道路逐渐凸显。1943年2月,在系统总结妇女运动实践经验和充分调研(妇女生活调查团在延安、绥德等地为期三个月的深入考察)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提出“妇女工作以生产为中心”的新方针,“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②。《四三决定》的提出,成为指导各个根据地开展妇女工作的重要文件。

但是,延安经验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落地面临诸多独特挑战:贫苦的山东农村妇女深受封建礼教影响,行为保守、思想守旧;此外,不同于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山东抗日根据地长期处于“敌后频繁的战斗流动环境”,在敌人的扫荡、分割下,生产和贸易是极度分散的,妇女参与集体劳动的客观条件更为艰难。基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如何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上作出了适当调整。比如根据地的纺织生产主要采取分散的家庭手工业模式,依靠群众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这种分散性生产方式不仅便于隐蔽和转移,规避敌人的打击,还能充分利用民间劳动力资源,确保军民布匹的基本供应。沿着《四三决定》确立的妇女工作方针,山东抗日根据地灵活开展战时环境妇女生产工作,以贴近实际的组织方式践行延安经验。

(三)妇女的解放诉求

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乡村社会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深厚的礼教传统。《礼记·内则》中“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规范,清晰地划分了男女在家庭中的职责和行为边界。这种通过礼制将差异固化为道德义务的方式,形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性别结构。班昭在《女诫·妇行》中“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的训诫,实质上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建构过程:将具有实际经济价值的纺织劳动纳入道德评价体系,实现了劳动形态的价值转换。妇女的劳动归于“妇功”,固化为女子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视为“天然义务”且遮蔽了其经济价值和社会属性。尽管农村妇女被排除在社会劳动之外,她们所承受的劳动压力却不容小觑。家务劳动构成了她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些工作既繁重又琐碎,大到操持一日三餐、浆洗洒扫、照顾老人孩童,小到手工制作衣物鞋子,以及以纺织、结发网、编帽辫为代表的家庭手工业和养鸡等副业生产,几乎覆盖家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全方位地维系着家庭的正常运转。农忙时节她们还必须投入繁重的田间劳作,形成“家务+农活”的双重负担。这种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使她们的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状态,加速了健康损耗和过早衰老。

缠足习俗造成山东妇女身体上的不便,成为女性突破劳动空间的又一大障碍。20世纪初期,山东地区仍普遍存在女性缠足的习俗,“山东妇女缠足风气就全国而言也是很盛的,甚至有人自诩‘吾鲁妇女缠足之风最盛’”^③,“农村的女孩子从五六岁起就开始用布裹脚,一直裹到十四五岁”^④。根据体测数据显示,缠足妇女的平均步幅仅为32厘米(正常成年女性步幅为65厘米),步行速度降低57%,最大活动半径不超过

^①任月英主编,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11妇女团体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2月26日第1版。

^③高洪兴:《缠足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④次乾:《山东农村妇女生活一斑》,《民众周刊(济南)》,1932年第4卷第31期。

500米。缠足的陋习也从身体规训上对妇女的活动能力进行限制，畸形的小脚不便于行走，走不了多远便气喘吁吁，这种生理限制不仅影响了日常活动，更将妇女牢牢禁锢在“内院-灶台-织机”的三角空间内，形成了一种隐形的身体囚笼。

无论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还是居于社会上层的官宦妻妾，都深刻感知着封建礼教束缚带来的精神痛苦。长期在山东鲁西北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在书中写道，“一个中国妇女，在笔者家里受雇多年，说到她结婚后很长时间都只能待在小村庄里，不允许走出狭窄的院子。某道台的妻子告诉外国女士说，她来生想做一只小狗，就可以去想去的方了”^①。这种痛苦的普遍性超越了阶级界限，反映出传统社会性别压迫的结构性特征。在山东农村，新婚妇女自杀事件时常发生，“自杀的主要原因大多是夫妻间感情破裂或者被丈夫仇恨抛弃”。^② 这些极端的选择，反映了当时社会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绝望反抗——她们既无法在父权压迫下获得基本尊严，又缺乏改变命运的社会支持，最终只能以生命为代价控诉压迫。妇女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知与反抗意识，构成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的内生动力。

二、大生产运动中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妇女的劳动建构实践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③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农村妇女的劳动实践经历了革命性的重构。通过参与集体变工小组、承担战时纺织业等关键经济任务，妇女们突破了传统家庭劳动的局限，实现了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跨越。这一劳动建构过程既是对传统性别分工的挑战，也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战时环境的重要实践。

（一）经济主体身份的确认

无产和贫困是近代农村妇女的两大基本特征，也是阻碍妇女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经济因素。为动员贫苦妇女参与纺织生产，改善根据地军民缺衣少食的困境，实现根据地布匹自给的目标。1942年，山东省妇联在《为纪念“三八”节对目前妇女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金融支持政策，要求“帮助妇女生产事业一定的资本。如各地银行、合作社，应尽可能地低利贷款给妇女”。^④ 实践证明，对农村妇女的纺织事业进行资金扶持的政策，通过解决她们赖以关注的织机、棉花等关键生产资料问题，为生产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2年9月，滨海区要求各地设立纺织生产合作社，并简化贷款流程，允许通过生产小组或合作社以集体担保的方式直接获取银行贷款。^⑤ 纺织贷款业务实施后，极大激发了妇女生产热情，滨海区妇纺事业蒸蒸日上，呈现热情生产的良好开局，短短三个月内就取得显著成效。据《大众日报》1942年12月21日报道，滨海区已拥有纺车7778辆、织布机796架，月产土布3000余匹，基本实现了明年全区党政军民的穿衣自给。政府累计发放贷款2.7万元，贷出棉花35139斤，惠及织布户275家、纺线户1630家，组建纺织小组73个。^⑥ 纺织带来的生活境况改善，也极大鼓舞了农村妇女参加妇纺运动的热情，“如葛南××庄因多数群众参加生产，现全村无一乞丐；敌占区（沂水十区）搬来的×××全家五口，来时只带高粱一斗，生活无法维持，自参加纺织小组积极生产后，现不仅每顿吃煎饼豆末，且每人都穿上新棉衣一套。大山前某老大娘七十多岁，旁的活都不能做，却贷了几斤棉花从事纺纱，两月来净赚一百五十余元”^⑦。正如黎玉1943

①[美]阿瑟·亨德森·史密斯：《中国乡村生活》，赵朝永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176页。

②次乾：《山东农村妇女生活一斑》，《民众周刊（济南）》，1932年第4卷第31期。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0页。

④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1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0-201页。

⑤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09-510页。

⑥《明年单衣不用洋布 人民生活逐渐改善》，《大众日报》1942年12月21日第1版。

⑦《明年单衣不用洋布 人民生活逐渐改善》，《大众日报》1942年12月21日第1版。

年在山东分局群工会议上的总结指出：“如妇女的纺织工作，在纺织大贷款以后，妇女工作很显然更加活跃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都提高了，家庭也更加和睦了。”^①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长期被排除在社会信用体系之外，“女子对外不能代表整个家庭。凡是关于契约的订立、信用契文的协定等，都得由家庭中的男子出面订定，女子绝不能代表家庭进行协商订定”^②。纺织贷款政策的实施，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将妇女作为独立的、能够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个体来看待。当妇女们以个人或集体名义向银行或合作社申请贷款时，她们实际上获得了传统社会中只有男性才享有的经济主体资格。这种制度性认可不仅突破了“女子不能代表家庭订立契约”的传统禁忌，更在劳动实践层面重构了农村妇女的社会经济身份。这里的纺织贷款，不仅是经济手段，更是身份确认的媒介。

（二）灵活的组织技术嵌入

在抗战时期的山东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成功将长期被排除在乡土生产体系之外的农村妇女纳入社会化生产网络，其中经过艰苦的思想教育，还得益于一系列组织技术创新。王燕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技术”旨在重构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除了讲求经济上的公平公正，兼顾各人利益，将人群的组合劳动力发挥至最大成效以外，还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和社区关系，构建互帮互助的和谐生活”。^③

变工互助是乡村社会长期沿用的生产习惯，“变工是由两户或两户以上的农民相互调剂使用劳力、畜力与农具，以满足各自农业生产上临时需要的一种组织形式”^④。在中国共产党进入山东地区之前，妇女是不参与变工互助的。为应对战时劳动力短缺问题，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变工制度进行了适应性改革，以吸纳更多妇女参与集体生产。随着变工互助运动向组织化程度更高的互助合作运动演变，工分制的组织技术在集体劳动生产模式广泛应用。据山东分局1944年对官地村的农业劳动合作调查显示，“一个整劳动力早晨下湖傍晚回家算十分，半劳动力算五分”^⑤。由于妇女作为半劳动力，增加了换工计工的工作量，在组织集体劳动中常常被忽略，因而造成了大量半劳动力的浪费，“战争中由于战争动员、参军等全劳动力减少得很多，因此半劳动力的组织在今后将是非常重要得问题，必须把这一部分力量组织在生产大军里来，换工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⑥传统的换工以男性劳动力的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长为计量标准，考虑到妇女的体能和生产习惯，如何实现较为科学的换工？妇女的劳动量如何衡量才较为公平？在保证劳动效率的同时，也要确保是妇女较为接受的工分计量标准，并能有效激发妇女生产积极性。这一目标的实现，直接关系到能否成功将妇女进一步组织到根据地的生产体系中来。

农忙时节，官地村吴福荣组安排三个男性全劳动力在地里收庄稼，三个妇女劳动力在场坝从事小麦晾晒去壳劳动，留一个妇女在家里做饭，负责全组的伙食。这种依据劳动体能和劳动习惯划分的工作内容，实现了不同劳动力的高效利用，该变工组“一天拔完二十一亩麦子，五天粮食收到屯里”。^⑦工分计算过程中，时间标准并非唯一依据，实际劳动效能同样被列为关键计量参数，“又如妇女剪高粱穗子，能跟两把镢头算十分，跟一把镢头的算五分，能跟一把镢头还多的算七分或六分等”^⑧。与此同时，在集体化生产模式下，原本隐身于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其价值开始显性化。在官地村集体劳动中，最初由各家分开做饭，

①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1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②次乾：《山东农村妇女生活一斑》，《民众周刊（济南）》，1932年第4卷第31期。

③王燕：《“妇女顶大事”大生产运动中妇女“劳动”的组织技术》，《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6期。

④贺金林：《抗日根据地的变工互助运动》，《党的文献》，2018年第2期。

⑤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5页。

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2页。

⑦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2页。

⑧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5页。

专人送饭,仅送饭人计工分。在实行过程中,由于各家吃的饭不一样,影响了生产情绪。群众建议“按人头凑上粮食,抽出妇女专门做饭,按半劳动力计算工资”,“这样可以保持同时开饭,另外,由做饭的送饭也不影响劳力”。^①过去“洗衣做饭”的隐形家务被纳入集体分工,妇女的家务劳动从分内之事变成了公共劳动,其经济价值通过家事换工的形式得到体现。山东分局在1944年底的行政会议强调,农闲时节,妇女的集体纺线和集体看孩子等劳动都可以纳入变工组的工分体系中。^②然而,劳动集体化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妇女在集体生产中获得了经济收益,大批的妇女热衷于纺线等集体劳动,浆洗缝补、烧火做饭的家务逐渐无人承担,引起了家庭成员的不满,激化了家庭矛盾,也阻碍生产的进一步推进。新的情况要求根据地在组织技术中充分考虑妇女的实际情况,探索更加公平合理的分工方式。为此,山东分局鼓励实行家庭内部分红,“因此必须公私兼顾,如嫂煮饭,姑纺线,赚的钱可分给她一部分,提高全家生产热忱”。^③这一灵活的组织技术缓和了妇女的家庭关系,又反过来促进战时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三)战时需求下的生产内容转变

在大生产运动的推动下,山东农村妇女的生产内容发生了转变——从传统自给性和商品化纺织生产转向以战时需求为导向的集体化生产:她们白天开荒种粮、抢种棉花,夜晚摇动纺车赶制土布,个人劳动被嵌入“耕战一体”的根据地经济链条中。

在纺织生产方面,根据地政府通过恢复传统家庭手工业模式,发动妇女广泛参与纺织运动。在山东农村,妇女的纺织劳动构成了家庭副业生产的核心内容。近代以来洋纱倾销、战乱冲击及市场挤压导致山东传统家庭纺织业迅速衰落,终至凋敝。抗战爆发后,洋布连年价格飞涨,根据地一度达到军民衣不蔽体的困境。1942年1月至3月,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接连发布《关于奖励保存棉衣的决定》《关于奖励保存棉衣之补充决定》,可以窥见当时对棉花布匹的紧迫需求。棉布是不可缺少之必需物,是根据地不可漠视的关键物资。纺织不再是小农经济中的一项辅助性生产,而是事关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关系抗战大局的重要产业。“山东党政民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经济封锁政策,于1942年冬便在各地成立纺织局,积极扶植纺织手工业的发展。”^④纺织业进入到管理视域中,农妇的指尖劳动纳入根据地的战时生产计划。土布作为典型的乡村手工业产品,通过组织化生产成为军需供应链的一环,反映了战时经济“自力更生渡过困难”的特点,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借用乡土生产逻辑的组织智慧。

战前农村妇女的纺织活动以家庭需求为中心,“农村家庭中每个人的衣服,都是由家庭中的妇女自己缝制”^⑤,而战时则转变为集体性、政治性的生产行为。“战士们我们并不认识你,我们却正为你缝着寒衣”^⑥,这首作于1943年冬的民歌,折射出当时农村妇女纺织劳动的变化。这种转变反映了战时经济与社会动员对传统生产内容的改造。在根据地极端困难的现实情境下,妇女的纺织劳动被纳入抗战后勤体系,她们通过“做军鞋”“缝寒衣”等劳动,实现了从个体家庭的纺织行为到支援抗战的支前行为转换。

在农业生产领域,农村妇女经历了从“辅助性劳动”到“主要劳动力”的转变,从抗属家庭的妇女开始逐步承担起开荒、植树、犁地、收割等田间劳动。由于传统农业习惯的影响,当时大部分地区的妇女并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缺少男性劳动力的抗属家庭率先展开了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尝试。滨海区劳动模范孙贵英在丈夫参军后,主动承担起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农业生产活动,成为全村首位

^①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1页。

^②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6页。

^③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2页。

^④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8页。

^⑤次乾:《山东农村妇女生活一斑》,《民众周刊(济南)》,1932年第4卷第31期。

^⑥山东省妇联妇运史编辑室编:《山东妇女民歌选》,1986年,第52页。

掌握扶犁耕作技术的女性。随着实践的深入,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1942年“三八”妇女节滨海妇联召开纪念会,号召全区妇女踊跃参加生产、植树、种菜、纺线织布,参加春耕,组织开荒。全区妇女热烈响应,10万妇女走向了生产第一线。全区植树737000余株,替军属代耕土地3010亩,开荒3000余亩,掘井31眼。”^①这些生产成果,让妇女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在弱势的体力活领域,妇女也有不输男子的能力。正如山东民歌所唱:“六月里太阳一盆火,手拿着锄头来下坡,忙生产那么积极干,姑嫂不弱男子汉”^②,展现了妇女投身农业生产的热情与能力。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妇女劳动多维度重构效应

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妇女劳动重构引发了多维度的效应。在经济领域,这场群众生产自救运动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也极大改善了妇女的生活条件,提高了她们的家庭地位。在观念领域,传统的“远离劳动”被“劳动光荣”取代,农村妇女重新确立对劳动价值的认同。在社会领域,这一实践唤醒了妇女的主体意识,农村妇女开始参与基层管理工作,为山东乃至全国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动力。

(一)缓解根据地经济困境

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起的大生产运动释放了农村劳动力,将广大妇女从私人家庭劳动领域中解放出来。在各级妇救会领导,妇女干部带头下,根据地广大妇女以极大的生产热情投入纺纱等各项生产中,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极大缓解了根据地的经济困境。从1942年冬山东各地成立纺织局算起,仅仅一年半的时间,胶东区、鲁中区、渤海区三区军民布匹全部自给,“滨海区和鲁南区纺织业的基础比较薄弱,滨海区于去年做到军队所用布匹的全部自给,今年可以供给人民所用布匹的半数以上,鲁南区去年因斗争环境十分紧张未能发展纺织生产,今年将可供给军队所用布匹。”^③敌人的政策原本封锁洋布,但在根据地纺织手工业发展后,不得不转为倾销,其封锁根据地的图谋最终失败。“到敌人投降时,全省已有纺车一百万辆,织机十六万架,以当时我们所占之地区来计算,所产土布大体上已可自足自给。”^④妇女参加纺织运动的重要贡献是“堵塞了一个最大的漏洞”^⑤,仅单只军队一年用布一项节省法币1亿元^⑥,这笔原本可能被敌人攫取的巨额财富,因根据地纺织业的发展而得以留存,极大增强了抗日政权的财政自主性。

大生产运动还增加了妇女的收入,改善了妇女的生活状况,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地位。“纺织妇女每四天纺线一斤(最快的每天纺半斤),可得工资十元、十五元至二十元,此数可赚粮食十斤上下”^⑦,“有的在纺纱中已赚了三百多元”^⑧,过去农村妇女被嘲“吃闲饭”的贬抑局面就这样打破了。在根据地某些地方,曾经“百补千孔的破棉衣”几乎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整洁暖和的新衣裳。薛暮桥总结道:“去年冬纺织业较发展的区域大多数的农家不论男女老幼都穿上了新棉衣,再没有人穿着单褂过冬的”,这与过去“敌占区与大后方普遍穿着单褂过冬”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家中的吃穿用度得益于妇女的收入获得改善,原先紧张的公婆、夫妻关系得到缓和。随着妇女收入的提高,她们的家庭地位也得到提升。这种变化生动地反映

①张侠主编:《鲁中南妇女运动史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5页。

②山东省妇联妇运史编辑室编:《山东妇女民歌选》,1986年,第9页。

③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8页。

④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页。

⑤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8页。

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9页。

⑦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8页。

⑧《莒北百余妇女参加纺织》,《大众日报》1944年2月23日第1版。

在当时的民歌创作中,“小纺车,大生产。张家大嫂真能干。家中吃穿不用愁,老少爷们心喜欢,人人尊敬张大嫂——谁说女人吃闲饭!?”^①转动的纺车,挥起的锄头,伴随着愉快的歌声,正在重塑着根据地的家庭伦理。

(二)重构劳动价值认同

山东抗日根据地将生产动员和劳动竞赛中涌现的典型人物,塑造成妇女劳动模范,赋予其政治荣誉和社会地位,从而颠覆了广大妇女“劳动低贱”的旧观念。根据地政府将妇女参与生产与抗战救国紧密联系,重构了劳动的价值认同,使原本受歧视的劳动转变为光荣的革命贡献。

在传统农村社会中,下地劳作不仅是贫穷和地位低下的象征,更被赋予了性别耻辱意蕴。经济条件优渥的家庭将妇女远离农田视为体面的象征,即便在贫苦人家,“吃苦受累”也被默认为男性应尽的义务。只有那些赤贫到难以为继的家庭,才会无奈地让家中女性抛头露面,以艰辛的田间劳作换取生存所需。这种将劳动与性别、地位紧密捆绑的社会观念,使得农村妇女形成了轻视劳动和远离劳动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地》就描写了一位刚从贫农跃升为富农的男主人公自白:“阿兰呢,他不再教她到地里工作了,因为现在不再是穷人,乃是想要雇个人就能雇到的人了。”^②阿兰的个案揭示了农村劳动观念的阶级性差异:当家庭经济跃升后,田间劳动立即被建构为“贫穷的标记”。沂蒙山区口述史显示,即便在农忙时节,妇女参与公开参与犁地等核心农活仍被视为“家庭男性劳动力缺失”的耻辱标志,只能进行拾麦穗等辅助性劳动。“那么多孩子,还得做饭,脚又小。……就是到农忙的时候去打打下手,摘个豇豆,拾个麦子了。谁家的老婆去地里干活,人家就笑话这家都没有人了吗?让个女人出来干活。”^③

1944年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关于纪念“三八”与开展妇女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各地区目前必须着手培养妇女纺织英雄,创造模范,到今年“七七”各战略区应培养出一个至三个为全体妇女所公认的模范或英雄(条件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形拟定)”^④,这一政策导向有力推动了根据地妇女劳动模范的培育工作。据《大众日报》1945年1月23日报道,在滨海区表彰的178名劳动模范中,女性模范达到26名。^⑤曾经在地主门口冻僵大半个身子才讨来一点煎饼的孙贵英,如今作为全票通过的劳动英雄,劳动事迹在《大众日报》被广泛报道。滨海区劳模大会上,“英雄们到处被人围着、拉着手、拍着肩,摄影记者忙着给他们照像”,孙贵英和其他劳动英雄并肩站在毛主席像前,胸前画挂着写有“劳动英雄”的红彩与大红花,当天恰逢赶集日,大批的群众也来到了典礼现场,现场的掌声和口号此起彼伏。^⑥这样热烈的场景,与她过去遭受的白眼和冷遇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劳动模范的涌现,让长期被压抑的农村妇女通过自己的双手,第一次获得了社会的尊重。妇女们发自内心的生产热情,源于她们真切感受到:劳动不仅能改变生活,更能改变命运。在“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的口号号召下,农村妇女的劳动贡献融入抗战大局,劳动价值标准上升为民族解放的高度。劳动生产不仅可以改善生活,获得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还能巩固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侵略者。这些极大冲击了农村妇女的内心世界,使她们逐渐确立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念。农村妇女观念从“远离劳动”到“拥抱劳动”,进而转变为她们参加生产、拥军支前的内驱力,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三)重塑妇女社会角色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⑦广大妇女参加大生产运动,获得了经济利益的同时,社会关系随着劳动场域的拓宽发生了变化。

^①山东省妇联妇女史编辑室编:《山东妇女民歌选》,1986年,第178页。

^②Mrs. Pearl S. Buck:《大地》,张万里、张铁笙译,北平:志远书店,1933年,第218页。

^③王克霞:《革命与变迁 沂蒙红色区域妇女生活状况研究 1938—1949》,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④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1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0页。

^⑤《滨海区一七八名劳动模范》,《大众日报》1945年1月23日第1版。

^⑥《滨海劳模大会民主选出廿八位英雄》,《大众日报》1945年2月3日第1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在传统社会中,妇女的活动范围被牢牢禁锢在“内院-灶台-织机”的三角空间内,其社会关系主要围绕血缘和婚姻展开,依赖婆家、娘家亲属网络而存在。然而,当妇女大规模进入社会化生产领域后,她们的社会关系不再仅仅由家庭关系定义,而是扩展至更广泛的生产协作、集体劳动和社会交往之中。她们与劳动者、管理者、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从而在家庭之外形成了独立的社会网络。这一变化使妇女从“家庭人”转变为“社会人”,其身份认同也随之从依附性向自主性转变。在大生产运动中,许多农村妇女脱颖而出,开始担任妇救会会长等公职,完成了从“家庭从属者”到“组织管理者”的角色跃迁。

伴随着劳动实践对妇女社会空间的拓展,农村妇女逐渐从封闭的家庭环境中走出。通过劳动,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收益,提升了经济地位,更塑造了社会交往模式。罗琼观察到在解放区,“由于妇女们参加生产,不再是依赖丈夫的寄生虫,而开始能够部分地‘自食其力’。因此,妇女们能够比较自由地参加社会经济政治活动,集市上的花纱布交易,大部分是妇女在参与”。^① 薛暮桥 1944 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内的纺织手工业》总结道,“在某些纺织生产特别发展、群众组织特别活跃的地区,青年妇女开始要求集体生活。当寒冷的冬天,往往一个温暖的地窖中,集合着几张布机或十几辆纺车热烈的纺着织着,休息时就说笑着,人声机声闹成一片”。^② 根据地妇女通过集体纺织劳动这一社会实践,在重构性别化生产空间的同时,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如果不吸引妇女参加公务、参加民兵、参加政治生活,如果不使妇女走出使她们愚钝的家庭圈子和厨房圈子,那就不能保证真正的自由,甚至不能建立民主,更不用说建立社会主义了。”^③ 列宁指出了妇女活动空间拓展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妇女获得真正自由的保障是挣脱家务劳动的束缚,进入到公共领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让妇女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解放,只能是虚伪的妇女解放。在大生产运动中,农村妇女社会关系的变化促使她们从家庭私人领域的边缘从属者转变为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山东临沭县的陈大娘早年以织布为生,她织的土布在布商中颇受欢迎。抗战时期,陈大娘积极响应大生产运动号召,积极宣传动员同村妇女织布纺线。据《大众日报》1944 年报道,因在大生产运动表现突出,陈大娘先后被推选为纺织合作社理事长、村妇救会会长,完成了从普通农妇到妇女工作带头人的转变。^④ 徐恒芳担任壮岗区妇救会期间,运用特殊的空心树枝制成纺线葫芦,成功改造了效率低下的旧纺车,其技术革新成果被《大众日报》头版报道,成为大生产运动中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典范。^⑤ 结合徐恒芳 1949 年南下干部经历在浙江任职^⑥ 轨迹可见,农村妇女通过生产领域的卓越表现,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约束,在革命语境下完成了从私人领域到公职系统的身份转换。

结 语

大生产运动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农村妇女以强有力的姿态进入到全国抗战大局的视野中。农村妇女积极参与纺织、耕种等工作,成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一年以来的大生产运动成效显著。据山东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财政收入统计》显示,仅税收一项,1944 年较 1943 年增长了约 120.1%。^⑦ 1945 年黎玉在《大反攻前夜的经济工作(草案)》指出,1942 年之前受制敌人经济封锁的危机大

① 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解放区农村妇女生产运动》,北京:新华书店,1950 年,第 43 页。

②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2 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263 页。

③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 2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42 页。

④ 常连霆主编,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15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509 页。

⑤ 临沂地区妇联主编:《沂蒙红嫂》,济南:黄河出版社,1990 年,第 241-242 页。

⑥ 《关于徐恒芳、刘建平两同志任职的通知》(1964 年 3 月 10 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J002-998-196406-086。

⑦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3 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439 页。

大转变，更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①这一转变不仅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难，巩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更重要的是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实施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全国战略方针的关键跳板。大批山东主力部队奔赴东北，承担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使命。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大量青壮年男性参军和加入支前运动，导致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战争形式的变化促使广大山东农村妇女大规模投入到农业生产、拥军支前的事业中，在维持解放区经济运转和支援前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党通过组织妇女参与生产劳动，引导妇女迈入社会公共领域，不仅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更从根本上找到了解放妇女的进入路径。虽然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妇女的劳动重构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传统性别分工，农村妇女背负“家庭+生产”双重劳动负担，造成了她们身份的紧张与生产的压力。工分制度下的男女记工差异，政治参与中妇女的弱势地位，可见妇女踏入社会生产领域仍遭遇阻碍与轻视。这种阻碍来自外界，有时也来自妇女自身。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训使她们不敢踏足社会领域，自卑自弱的心理定势使她们更愿意“偏安家庭”。但是纳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体系的劳动依然深刻改变了她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她们在集体劳作中哼唱革命歌谣，在纺线织布中接受文化教育，在生产表彰中赢得社会认可，在基层事务管理中开始担任重要角色。回看八十年前的这场运动，它不仅在农村妇女的劳动重构过程中唤醒了她们的主体意识，更推动她们逐渐向新民主主义社会新型女性的身份转变。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灵活切实的政策举措和组织技术，其蕴含的智慧对新时代的妇女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From Family Fetters to Social Awakening: Labor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Women in Shan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in the Mass Production Movement (1942—1945)

ZHU Cheng-shan¹, LI Lin-lin²

(1. Red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614,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614, China)

Abstract: The CPC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the women's libera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as an important practice in promoting social change in China.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Yan'an's experience of "promoting women's liberation through labor liberation", the Shandong base area has explored labor forms that meet both wartime economic needs and gender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 including restoring the household handmade textile industry, adopting the "work point system" for housework, and adjusting production content, bringing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women into the production system of the base area. In this process, the enthusiasm of rural women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the mass production movement was mobilized unprecedentedly. They came out of the fetters of their families one after another, support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with practical actions,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the whole nation strength.

Keywords: Shandong; The Mass Production Campaign; labor concept; women's liberation

[责任编辑 山阳]

^①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5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5页。